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doo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K521.0
1

奥地利史

史蒂芬·贝莱尔 著 黄艳红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ia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

ISBN 978-7-5000-8231-6



9 787500 082316 >

定价: 40.00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奥地利史

史蒂芬·贝莱尔 著 黄艳红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ia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09-5507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ia[1](978-0-521-47886-1) by Steven Beller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09]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地利史/贝莱尔著;黄艳红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00-8231-6

(世界历史文库)

I. 奥… II. ①贝…②黄… III. 奥地利-历史 IV. K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5269 号

责任编辑 郭银星 王亦妮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10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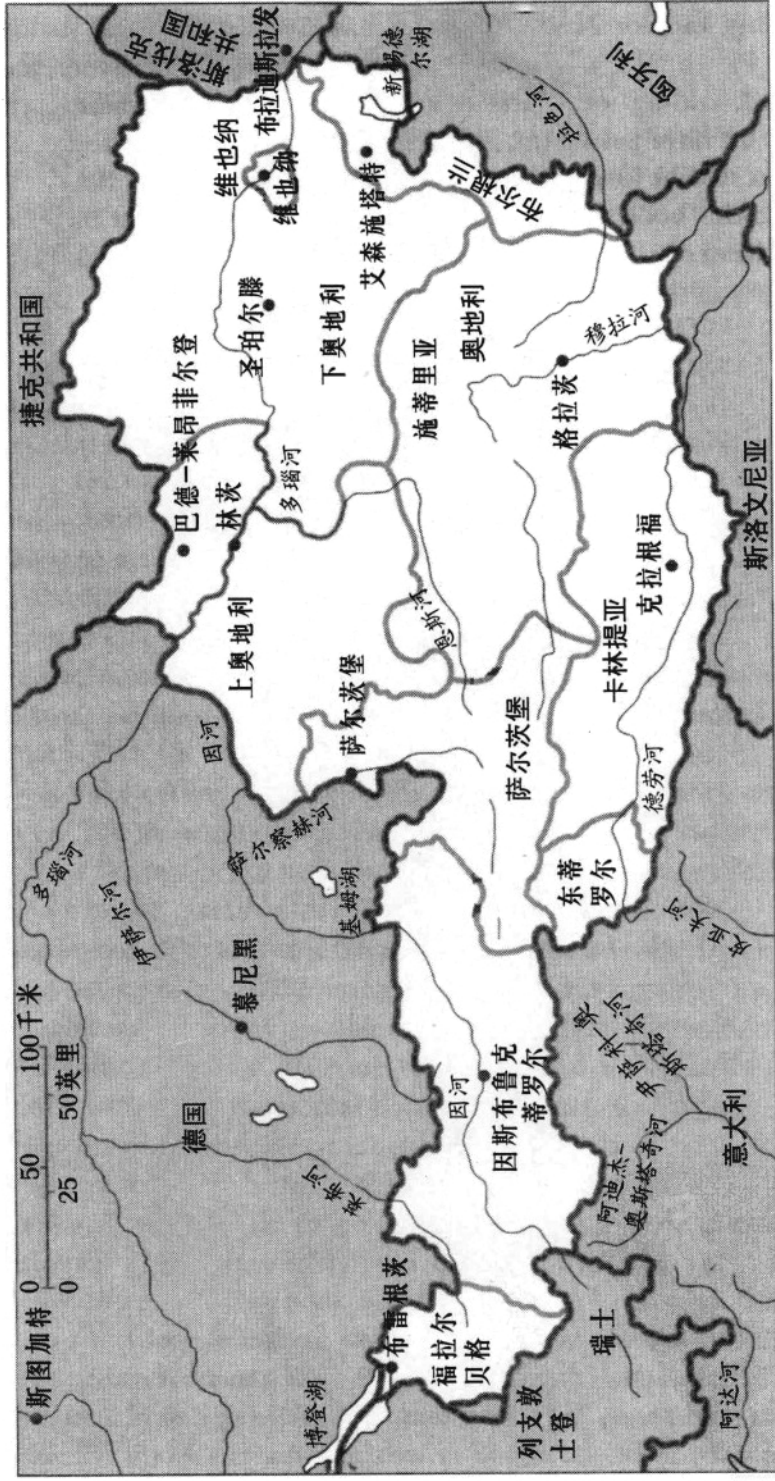
主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地图1 奥地利共和国, 2006年

致 谢

很多年前，当比尔·戴维斯（Bill Davies）问我是否知道谁有兴趣写一本简明奥地利历史时，我很轻松地来了个毛遂自荐，虽然这个决定有点不够谦虚。创作这样一部书看起来颇具挑战性，但真正写起来可能相当简单，而且不会花太多时间。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种简明是多么耗费时间，一部奥地利的简明历史几乎缺乏连续性——对于这样一不大的国家来说也是这样。写作这本书甚至花了我更长的时间，但现在它终于完成了，我希望它既有助于为理解奥地利极具吸引力的历史提供基本的轮廓，又有助于认识到这一点：奥地利历史的广阔和复杂使得任何方便简明的阐述并不像乍看起来的那样容易（至少不像我当初认为的那样容易）。的确，奥地利历史之所以有魅力，部分原因正在于这种广阔性和复杂性，但我希望读者能在随后的阅读中自己去领会这一点。

在这个研究项目刚开始时，我有幸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一员，随后又担任维也纳中欧文化国际研究中心（IFK）的研究员，这些经历对我帮助甚大。我还要感谢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给我讲授哈布斯堡君主制历史的课程。此外，我想感谢多丽丝（Doris）和安德鲁·布里默（Andrew Brimmer）的慷慨宽容，还有我美丽而宽厚的妻子伊斯特·戴安娜·布里默（Esther Diane Brimmer），她的支持是我得

以完成此书的主要原因。

我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太多了，我恐怕不能在这篇简短的致谢中——列举他们的名字——在我写作这部著作时给了我帮助、鼓励和建议，尽管有时是因为他们的不同意见而收此效果。我感谢所有在奥地利、美国、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和同事。我还要特别感谢：国会图书馆的布鲁斯·马丁（Bruce Martin）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最有益的帮助；德雷克·比尔斯（Derek Beales）耐心地回答了我就书中的插图提出的无知问题；维也纳《标准报》（Der Standard）艾哈德·施塔克尔（Erhard Stackl）也对本书的几个问题提供了至为有益的协助；维也纳人文科学院的克劳斯·内伦（Klaus Nellen）一直是我善意的听众和协助者。还要感谢尤里安·索法尔（Julian Sofaer）慷慨允许我为此书复印两幅格哈特·弗兰克尔（Gerhart Frankl）的绘画作品，以及答应我将巴德—莱昂菲尔登（Bad Leonfelden）《地方志》（*Heimatsbuch*）中的几幅照片在此付印的马格·弗兰茨·胡默尔（Mag. Franz Huemer）。另外，我还要向汉斯·海德尔（Hans Haider）、雷吉纳·胡贝尔（Regina Huber）、沃尔夫冈·雷山茨（Wolfgang Leschanz）、格哈德·米尔克拉姆（Gerhard Milchram）、雷纳特·派因（Renate Pein）、鲁道夫·希默坦（Rudolf Semotan）和威廉·瓦德尔（Wilhelm Wadl）致以最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慷慨应允本书使用各种插图。

埃文·布凯（Evan Bukey）、阿兰·雅尼克（Allan Janik）、阿维尔·罗什瓦尔德（Aviel Roshwald）和大卫·索尔金（David Sorkin）十分友好地阅读了部分手稿，并就如何改进书稿提供了建议，对此我深表谢意。但他们对定稿中的任何错误不负担任何责任。

我同样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各位员工，首先是比尔·戴维斯，是他给了我写作本书的机会，并竭尽所能地关注此事。马里戈尔德·艾克兰（Marigold Acland）、克里斯·哈里森（Chris Harrison）和伊丽莎白·霍华德（Elizabeth Howard）对作者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在此也谨表谢忱。伊莎贝尔·丹布里古尔（Isabelle Dambricourt）、乔·布里兹（Jo Breeze）、卡罗尔·菲林汉姆·韦布（Carol Fellingham Webb）

及制作组对本书最终的出版付出了耐心和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几位尚未提到的人，他们多年来的友好招待和垂范为本书贡献了很多特别之处，他们是：乔治（George）和克里斯特尔·克莱尔（Christl Clare）；伊丽莎白·德·吉尔塞（Elisabeth de Gelsey）；维尔纳·埃希鲍尔（Werner Eichbauer）；克里斯特尔·法布里齐（Christl Fabrizii）；马塞尔·福斯特（Marcel Faust）；库尔特·鲁道夫·费舍尔（Kurt Rudolf Fischer）；玛莎·霍夫（Mascha Hoff）；英格堡·劳（Ingeborg Lau）；希尔德·施皮尔（Hilde Spiel）；尼克·瓦格纳（Nike Wagner）和海波克（Haiboeck）大家族的所有成员，无论他们是在巴德—莱昂菲尔登、马赛、萨尔茨堡、林茨，还是在纽约。阿兰（Alan）和比亚·科尔干（Bea Corgan）、扬（Jan）和赫尔塔·帕尔默（Herta Palme）同样为本书做出了贡献，最然他们并不总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上面提到的很多人先后故去，我的父亲“老好人”米尔顿·贝莱尔（Milton Beller）也在此间去世。正因为他深爱着我母亲赫尔米·贝莱尔（Hermi Beller），一个奥地利人，才会有我，有这本书。因此唯有此书能献给我的父母，献给他们的孙子纳撒尼尔（Nathaniel），因为书中的故事也有他的一部分。

史蒂芬·贝莱尔

奥地利史

史蒂芬·贝莱尔

现代奥地利是个繁荣的中欧小国，但它有一段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历史，这段历史远远超出它如今的国境线。今天的奥地利人与其历史的关系存在一些困扰，无论是哈布斯堡君主国那段多民族的历史，还是1938—1945年作为德国人的奥地利人在希特勒第三帝国时期的历史。史蒂芬·贝莱尔以引人入胜、全面深入的阐述追溯了奥地利非凡历程中的诸多变迁：从作为德意志军事边区到王朝世家的建立，从成为帝国皇室家族到建立中欧大帝国，从失败的阿尔卑斯共和国到德国的一个地区，再到成功的阿尔卑斯共和国，奥地利的特性和遗产及其多姿多彩的源泉构成了一幅多层次的画卷。这是一段充满反常与另类色彩的故事，是探讨欧洲历史的另一面的力作，它并非以更为清晰的民族叙述方式给出方便的答案，因而更切合于今天的世界。

史蒂芬·贝莱尔 (Steven Beller) 是位独立学者。他已出版数本有关奥地利历史的著作，如《维也纳和犹太人，1867—1938年：一部文化史》(*Vienna and the Jews, 1867—1938: a Cultural History*, 1989)，《特奥多尔·赫茨尔》(*Theodore Herzl*, 1991) 和《弗兰茨·约瑟夫》(*Francis Joseph*, 1996)。

导 论

奥地利人可以说是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奥地利历史则是一段没有民族的历史。一直到1945年以后，奥地利人才真正尝试构建一种同德国人分离的民族身份，他们取得了成功。不过，作为一个清晰可辨的历史概念，奥地利甚至远在民族—国家观念诞生之前就出现了。如今的奥地利只有800万人口，对这样一个小国来说，奥地利历史有着一番不幸的命运遭际。

然而，这段历史很难简单地称为“民族”历史，因为其中的很多内容涉及今日奥地利边境之外的地区和人民。直到1918年，奥地利还是个多民族的王朝帝国，或被称为哈布斯堡君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部，阿尔卑斯山区世袭领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上的日耳曼人只是其他“奥地利人”（如捷克人、鲁赛尼亚人，等等）中的一种族裔“民族”（ethnic nationality）。1918年以后，虽然“奥地利”继续以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存在，但很少有“奥地利人”把这个奥地利视为君主国家崩溃后的最佳替代品，大多数人情愿与德国合并（Anschluss）。这个愿望在1938—1945年得以实现，但结局是可怕的，纳粹德国将奥地利人纳入其战争和杀戮机器，使其成为对犹太大屠杀的同谋和全面溃败中的难友。

1945年以后崛起了一个新兴的、独立的奥地利。奥地利的领导者

们有意识地创建起一种新的认同感，这既要创立两次大战之间曾一度痛苦地缺失的团结，又要将“奥地利人”和1938—1945年间“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区分开来。1945年之后奥地利的重生是战后欧洲重建中诸多奇迹中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和平、对外采取的中立政策和全面的历史和解，这一切使得奥地利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世界上最繁荣最安宁的国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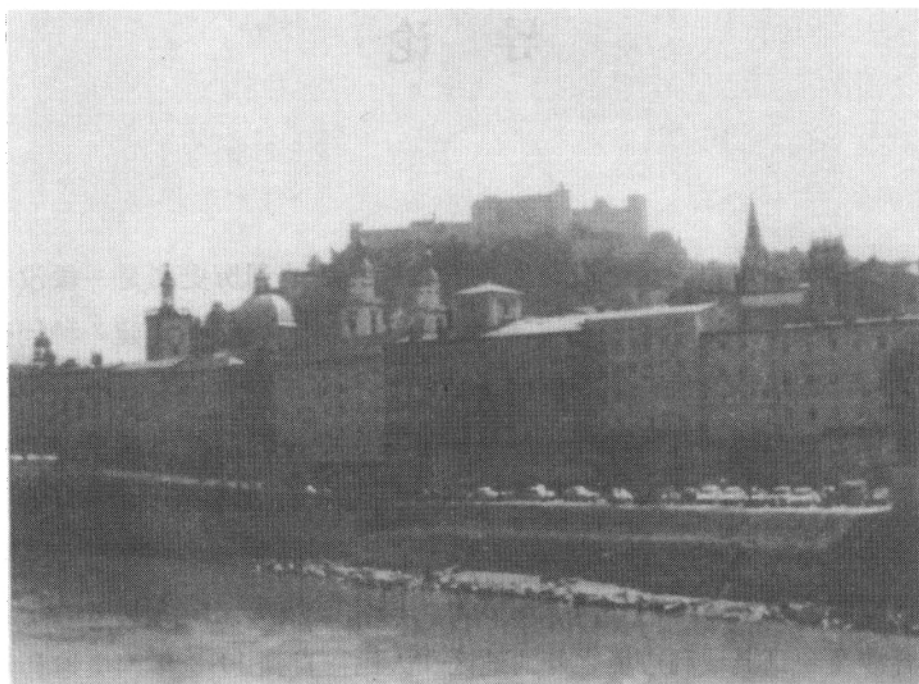


插图1 萨尔茨堡

从表面上看，即使是在今天，奥地利仍然堪称“至福岛”。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欧盟中最高的国家之一，奥地利的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转型，它利用居民高水平的技术教育，将经济的基础从工业转向了服务业。奥地利人享有的福利国家慷慨而周到，他们的犯罪率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尤其是在暴力犯罪方面。

这个国家地处欧洲中心，过去这是个很大的不利之处，如今则有着很大的潜在优势。由于夹在德国和意大利之间，奥地利在两次大战期间曾是两大强国争夺的猎物，但现在，作为欧盟内部市场的一部分，

这种地理位置使得奥地利具有了商业上的战略意义。在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被哈布斯堡君主国瓦解后新成立的国家包围着，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种状况造成的是政治上的敌对和经济上的混乱。1945年，共产党在这些邻国掌权，奥地利的很长一段边境成为了铁幕，于是这个国家处在了“西方”的边缘上。

随着苏东剧变和2004年欧盟的扩大，如今奥地利边境地带的经济蒸蒸日上，奥地利也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机会。另外，欧盟的东扩终于使奥地利置身于奥地利人一直认为的独特位置上：“欧洲”的中心，而不是欧洲的东部边缘。人们或许可以认为，奥地利人应该觉得他们民族的重大变迁是件十分幸运的事。

然而，奥地利历史的重负，尤其是1938—1945年那个不是“奥地利”的奥地利发生的事件，仍然在提醒、纠缠、困扰着国民的自我理解。1986年以后，瓦尔德海姆（Waldheim）事件引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陈年幽灵，并在国外舆论中造成震动。此后弗拉尼茨基（Vranitzky）政府的行动表明，奥地利人正试图严肃认真地对待“他们的”过去。但是，本来能被遏制的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的崛起及其极右翼的自由党的上台（虽然是与温和的保守派结盟）则有着另一番意义。一件十分矛盾的事情是：以“无忧无虑”的天性而闻名、生活在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中的奥地利人，当他们被问及自己“民族”的过去时，仍是极度敏感，甚至有些忸怩和局促不安，并且怀有戒心。

奥地利历史造成的这种苦恼是有很充分的根据的。今天的奥地利和奥地利人和从前的奥地利与“奥地利”人之间有十分剧烈的断裂，这就是我们开篇处提到的核心矛盾所在。历史上的“奥地利”身份认同问题纠缠不清、错综复杂，这个难题的根源在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奥地利”无法让自己适应民族—国家构成的“现代”世界。这就给中欧留下了一笔麻烦的遗产，与此同时，这也使得“奥地利”成为20世纪众多精神、思想和文化潮流的中心，不管这些潮流的影响是好是坏。

当代的很多奥地利人希望接纳双重遗产：超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国

的奥地利，以及世界主义的“维也纳1900”。但这种抱负造成许多困难，其中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在实现这一抱负时不致落入那个罪孽深重的泥沼中，即不与1938—1945年的“插曲”发生瓜葛。援引别的“奥地利”历史来支持当代奥地利的民族认同，所有这类企图在道义上都是危险的。挑拣或选取“奥地利”历史的某些部分作为依据，这种做法是不可能的，为追求某种宜于操作的民族历史而被略去的章节已经以十分尖锐的方式产生了反作用。今天的奥地利人是否完全愿意同自己的过去——包括过去那段曾试图隐瞒的历史——和解，仍需拭目以待。

即便是看起来“有用”的历史片段实际上也并不总是与其表面意义相符。1991年9月19日，在豪斯拉比约赫（Hauslabjoch）附近阿尔卑斯山上的厄茨塔尔（Ötztal）冰川上发现了一具尸体。一个救援队从因斯布鲁克（Innsbruck）赶了过来，人们以为这是个遇难的登山者，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具尸体是一个几千年前被杀死的男子，事实上也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好的青铜时代的尸体。奥地利的公共舆论，特别是那些耸人听闻的小报，对此事的反应带有某种民族自豪感，因为“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是个奥地利人。当然，“冰人厄茨”（Ötzi）早在奥地利这一观念诞生之前几千年就死去了，但称呼远古时代的人为“祖先”并非反常的做法，这就像英国人把巨石阵视为民族骄傲一样。但奥地利人对“冰人厄茨”的诉求接着便受到一次毁灭性的重创，因为当人们重访发现地点时，已注意到冰人实际上是在意大利境内被发现的，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边境线刚好横穿豪斯拉比约赫的中心。多次辩论过后，两个国家达成如下协议：奥地利人可以暂时将厄茨保存在因斯布鲁克，以供研究，但之后厄茨须交给意大利人永久保管。这个“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意大利人”（冰人看起来的确像是来自地中海一带）如今留在了意大利奥尔托·阿杰迪（Alto Adige）省的博尔扎诺（Bolzano）城，而这个省又称南蒂罗尔（South Tyrol）。

这样一来话就很长了。对大多数奥地利人而言，南蒂罗尔应该是奥地利的一部分。这个省的居民大部分讲德语，意大利对这个省的主权一直是有争议的，因为该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协约国交给意大

利的，为的是报答后者 1915 年的参战。虽然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平息，但边境两侧的蒂罗尔人仍把南蒂罗尔视为大蒂罗尔的一部分。一直到最近的时候，因斯布鲁克的一份主要报纸《蒂罗尔日报》的抬头处仍有一份这样的蒂罗尔地图：属于奥地利的两部分为深色（北方和东方），南蒂罗尔为浅色。大部分南蒂罗尔人对自治和意大利政府给予的其他特许权感到满意，但他们无疑仍自认为是蒂罗尔人。因而“冰人厄茨”既不是奥地利人也不是意大利人，而是蒂罗尔人。



插图2 蒂罗尔的身份认同(《蒂罗尔日报》)

“冰人厄茨”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今日奥地利的一个惊人的现实状况：对这个 800 万人口的国家而言，它的地区多样性着实让人吃惊，9 个省^①都具有强烈的地区特色。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于国家坐落在山区，而且西部地区延伸得过长。最西端的福拉尔贝格（Vorarlberg）毗连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并因此跟莱茵河联系在一起，该省与德国和瑞士交通网的融合程度远高于同奥地利交通网的融合。从布雷根茨（Bregenz）乘火车到维也纳耗时比到巴黎还长。蒂罗尔主要位于阿尔卑斯山区，因而一度是作为旅游胜地的现代奥地利的中心。但它同样远离奥地利的主要的、“肥大”的组成部分，它的地方独立传统相当强固，这是它相对较晚地于 14 世纪并入哈布斯堡“奥地利”领地的部分原因。另一个省也对现代奥地利的文化特性及其旅游产业具有中心意义，这就是萨尔茨堡（Salzburg），但它直到 1816 年才完全并入哈布斯堡君主国家。当莫扎特（Mozart）1756 年在这里出生时，他还不是“奥地利人”。

7 南方和东方各省或各州（Länder），即施蒂里亚（Styria）和卡林提亚（Carinthia），它们归属奥地利的传统更长些，施蒂里亚早在巴奔堡（Babenberg）时代就与奥地利的核心地带合并，卡林提亚 1336 年归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但是，阿尔卑斯山限制了它们同北方的联系，而河流又是向南流的，因此从历史上说，这两个省与它们的北方邻居有着不同的关切。它们的北方邻居是奥地利的核心部分，即横跨多瑙河的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维也纳原是下奥地利的首府，现在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省。最东边的布尔根兰（Burgenland）毗邻匈牙利和多瑙河平原（puszta），它的奥地利传统最为短暂，历史上它是匈牙利的一部分，直到 1919 年才归属奥地利。

从地理宽度上说，奥地利从莱茵河延伸到匈牙利平原，阿尔卑斯山横亘中间，再加上各省的历史多样性，这些都助长了地方身份认同

① 作者把今日奥地利的一级行政单位称为省（province），但有的著作和工具书中作“州”（state 或 Bundesland），这里按原文译作省。——译者注

和地方性忠诚，并使得任何简单明了的奥地利认同诉求变得十分勉强。这种地方性倾向目前已被部分地缓和，因为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国家的肥大部分，即多瑙河谷地和维也纳。上奥地利、下奥地利及维也纳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尽管如此，小省的地方认同，以及它们对阿尔卑斯传统的强调——全国一半以上的地区为森林或不毛之地——仍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在今日奥地利的身份特性中。实际上，这种身份特性的核心主题可被视为“多瑙河”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奥地利两种主旋律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二者大致与布鲁诺·克莱斯基（Bruno Kreisky）所称的“河谷民族”和“山地民族”相对应。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国家的东西两部分之间存在分裂，或更简单地说，维也纳与其他地区存在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由来已久。

奥地利历史中最关键的问题浓缩在瓦尔德海姆事件的一个小插曲中。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在回答有关其战时表现的问题时陈述道：“我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数十万其他奥地利人的作为，就是说，我只是在履行作为一个军人的义务。”

这种辩护看起来很合理，不过，一旦你问他是向什么人、为了什么而履行义务时，这种辩词就很奇特了。由于奥地利曾被纳粹德国“征服”，瓦尔德海姆并不是为奥地利，而是为第三帝国、为推定的外来篡夺者履行义务。按通常的理解，“义务”只能是向合法的权威履行的，而在现代民族国家只能是为自己的民族、说到底是向道德上更高的自我主体履行义务。如果第三帝国如大多数奥地利人认为的那样，并不是合法的权威，那么就不可能向它履行“义务”。因此，瓦尔德海姆的说法使人对奥地利是“第一个遭受入侵的国家”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并突出地反映了二战期间“奥地利人”在民族认同上的深刻矛盾。如果一个在二战期间为德国人作战的捷克政客说出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奥地利与纳粹的历史一直存在麻烦，瓦尔德海姆的陈辞被视为这种麻烦的一个片段，是一种将第三帝国视为合法权威的漫不经心的残

留意识，因为奥地利人曾自认为是德意志人、并认为德奥合并是合法的，虽然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个错误。这种看法可能有其合理之处，但我认为另一个解释更为贴切。

瓦尔德海姆所称的“义务”，其意义并非西欧意义上的义务，甚至也不是北欧的、康德传统的德国意义上的义务，它是一种中欧形式上的义务，与数个世纪的哈布斯堡君主制传统关系密切。这种意义上的“义务”（Pflicht）不考虑谁是命令者，是命令就应该服从，因为从本质上说，发出命令者必定是一个权威者，或者是“多重权威”，所以必须服从命令，但对权威的基础则不去质疑。这是臣民的“义务”，而不是公民的义务。

瓦尔德海姆关于二战期间的奥地利人的评论指出了奥地利历史中一种更为深远的遗产：为哈布斯堡王朝寻求合法性和权威之基础而历时几个世纪的艰难探索，目标是使其在统治自己的领地时不致有冲突矛盾之虞。1945年以后，奥地利人有选择地运用自己的历史来构建某种历史认同，这种认同可以为奥地利民族国家带来某种合法性及权威性，不过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奥地利历史的中心主题曾是寻找“奥地利”的确切内涵，即寻找能为统治提供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某种本质、某种意义，否则这种统治就只是对一堆王朝领地的家族统治。

9 哈布斯堡家族最初是瑞士原初民主制的反对者，后来成为新教民族国家的反对者，接着又充当法国大革命时代自由的民族国家的反对者，最后终于被本国各族人民（及邻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冲垮。在整个这段历史中，“奥地利”一直在努力寻找自己的本质特性，以便使自己、使自己在他人面前取得合法性。它有时取得了成功，但绝非长久和全面的成功，而且总是缺少一点信心。奥地利历史是欧洲史中一个另类的个案，是主流的民族国家催生的政治协调统一观念的对立面。战后奥地利在历史问题上和身份认识上的尴尬是其漫长的历史传统的一个部分。

致 谢 / 1

导 论 / 1

第一章 1439年前的东部边区 / 1

一、公元一千年之前的奥地利 / 1

二、巴奔堡时代,1000—1278年 / 6

三、哈布斯堡时代的开端,1278—1439年 / 17

第二章 AEIOU:普世君主国之梦,
1439—1740年 / 29

一、普世君主国,1439—1556年 / 31

二、基督教世界的堡垒,1521—1648年 / 42

三、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奠基,1648—1740年 / 59

第三章 困顿与改革,1740—1866年 / 79

一、开明国家,1740—1792年 / 80

二、正统帝国,1792—1848年 / 98

三、进步的挑战,1848—1866年 / 118

第四章 协商帝国,1866—1918年 / 136

一、妥协君主国,1866—1879年 / 137

二、变革中的奥地利,1879—1908年 / 145

三、分崩离析的帝国,1908—1918年 / 170

第五章 失根的国家,1918—1945年 / 189

一、孤儿共和国,1918—1927年 / 190

二、文化战争,1927—1938年 / 204

三、希特勒时代,1938—1945年 / 223

第六章 1945年以后的奥地利联合社团 / 241

一、免费的断裂,1945—1955年 / 241

二、繁荣之路,1955—1970年 / 253

二、至福岛,1970—1985年 / 263

三、为未来而反省:1985年以后的历程 / 277

结 论 / 301

进一步阅读书目 / 307

索 引 / 316

第一章 1439 年前的东部边区

一、公元一千年之前的奥地利

奥地利的历史发端于 10 世纪后期，当时它是巴伐利亚公爵领 (duchy of Bavaria) 的一个东部边区。正是在这个时期，位于多瑙河谷的一个地区被称为“东方地带”，拉丁语为“terra orientalis”，在当时该地的德语中为“ostarrichi”。在中世纪早期的书面文献中，“Österreich”^① 的对应词最早出现在 996 年。在 11 世纪，这个边区有时也被称为“Osterlant”，而“Austria”一词的拉丁语形式于 1147 年首次出现在文献中。

虽然 1945 年之后的奥地利历史学家们竭力论证说，这个边区实际上从来没有被称为“Ostmark”^②，但实际上它仍是巴伐利亚宗主权下的日耳曼王国的一个东部边区，即日耳曼人东南边境地带的军事管辖区，奥地利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

正如“冰人厄茨”的发现所表明的那样，人类活动早在“奥地利”这一概念诞生的几千年前就已出现在这个地区。由于这里是山

① 即现代德语中的奥地利，意为“东方地带”。——译者注

② 即东部马克或东方边区。——译者注

地，早期的人类定居地很少。这个地区没有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霍尔施塔特（Hallstatt）的铁器时代文化的出现相对较晚，大约在公元前800年。从那个时期直到公元前400年左右，这个地区中的主要群体是“伊利里亚人”（Illyrians），后来他们大部分被凯尔特人（Celts）赶走，后者主要是诺里奇（Norici）和陶里奇（Taurisci）部落。拉挨提人（Raetii）仍然控制着今日福拉尔贝格和蒂罗尔的山地要塞，但在东部地区，凯尔特人于公元前200年左右建立起诺里孔（Noricum）王国。公元前2世纪，诺里孔王国受到北方日耳曼部落日益强大的压迫，最终于公元前15年和平地并入罗马帝国。而拉挨提亚（Raetia）则被罗马强制占领，很多拉挨提人被迫流亡。

罗马的统治延续了500多年。此外，罗马人还征服了诺里孔东边肥沃的潘诺尼亚（Pannonia）省，并试图征服北边的日耳曼部落。公元9年，日耳曼的切鲁西（Cheruscii）部落在条陀堡（Teutoburg）森林让罗马军队遭受惨败，罗马人只得退守多瑙河，于是诺里孔变成了帝国的边缘地带，其边境最终成为界墙（Limes）——即横亘欧洲的罗马军事城墙——的一部分。已经存在的凯尔特人据点变成罗马的市镇（municipia），如伦提亚（Lentia，今林茨，Linz）、尤瓦武（Juvavum，今萨尔茨堡）、布里干提姆（Brigantium，今布雷根茨）和文多伯纳（Vindobona，今维也纳）。潘诺尼亚首府卡努图姆（Carnuntum）位于界墙的最东端，一度是个重要的罗马城市。葡萄的栽培已经被引入该地，联系广泛的道路体系建立起来，罗马文明繁盛一时。

在相对和平的公元1世纪，罗马对界墙以北的日耳曼部落，如纳里斯提人（Naristi）、马克曼尼人（Marcomannii）和克瓦迪人（Quadii），尚能行使控制权，但此后，日耳曼人入侵的威胁日渐加剧。172年，皇帝马可·奥里略（Marcus Aurelius）亲临该地，以驱逐马克曼尼入侵者，180年他在文多伯纳驾崩，这使维也纳第一次扬名。公元3世纪以后，阿勒曼尼人（Alemannii）成为主要威胁。罗马人的军事存在不断增长，但边防却日益松懈。到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期，罗马军队很多已是由日耳曼雇佣兵组成。公元4世纪后半叶，罗马人

准许一些躲避匈奴人 (Huns) 侵扰的日耳曼部落定居在界墙内侧, 并把他们作为罗马防御体系的构成部分。

但是, 东哥特人 (Ostrogoths)、东日耳曼人和匈奴人的攻击接踵而至。面对匈奴人的威胁, 罗马人于 433 年撤出潘诺尼亚, 当阿提拉 (Attila) 于 453 年死去后, 哥特人 (Goths) 占领了这个地区。而这时的诺里孔已被日耳曼的鲁基 (Rugii) 部落控制, 488 年, 诺里孔基督教化和罗马化的居民被勒令撤离。拉挨提已经落入阿勒曼尼人之手。493 年以后, 阿尔卑斯山东部地区成为提奥多里克 (Theodoric) 的东哥特帝国的一部分, 罗马时代结束了。

部落“移民”运动仍在继续, 多瑙河谷地无疑是移民的首要通道。500 年左右, 伦巴第人 (Langobardii 或 Lombards) 出现在这个地区的北部和东部。567 年, 来自东方的阿瓦尔人 (Avars) 又将他们赶走。569 年, 伦巴第人在意大利北部落足。但阿瓦尔人继续迁移, 还有一些斯拉夫 (Slavic) 部落跟随他们。在北部和西部, 另一个日耳曼部落, 即法兰克人 (Franks) 的附庸巴尤瓦里人 (Bajuvarii) 也进入这个地区。于是阿瓦尔人、斯拉夫人与巴尤瓦里人 (亦即巴伐利亚人 Bavarians) 为争夺该地的控制权而发生对抗。

12

公元 7 世纪初, 阿瓦尔人控制了从波罗的海沿岸到巴尔干的广阔地带。他们从欧亚大草原驰马进攻, 横扫所有对手。拜占廷 (Byzantium) 曾利用他们对付匈奴人和斯拉夫人, 这两大部落于 6 世纪初出现在巴尔干地区。阿瓦尔人征服斯拉夫人, 后者变成了他们的附庸, 于是阿瓦尔人可以重新分派征服来的土地, 以照顾阿瓦尔主人们。600 年时, 巴伐利亚人和斯拉夫人仍在争夺阿尔卑斯山以东的大片地区。626 年, 阿瓦尔人同波斯人联合进攻君士坦丁堡。但这次行动失败后, 阿瓦尔人的斯拉夫附庸反叛了。北方的斯拉夫人选择法兰克人萨摩 (Samo) 作为他们的王; 阿尔卑斯山区的斯拉夫人, 即卡兰塔尼人 (Carantanii), 选举巴伐利亚人奥迪罗 (Odilo) 为他们的伯爵。后来阿瓦尔人征服了北边的萨摩王国, 但卡兰塔尼人 (亦即卡林提亚人) 的土地仍在巴伐利亚人的控制下。在这两个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地区之间是相对肥沃的多瑙河谷地及周边山丘地带，巴伐利亚人在这这里并同斯拉夫人及其阿瓦尔主人作战，同斯拉夫人的定居运动做斗争。650年前后，斯拉夫人的据点已延伸到普斯特塔尔（Pustertal）。此后，斯拉夫人的据点在巴伐利亚人的压迫下开始退缩，到780年，恩斯河（Enns）成为巴伐利亚人和斯拉夫人的界河。

巴伐利亚人成为这个地区占据支配地位的力量。他们开始是东哥特人的附庸，后来一度为法兰克人效劳，但在公元6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和公元7世纪，他们可以自行其是，法兰克人的控制时断时续。他们向东方和南方扩展，在多瑙河谷地和阿尔卑斯山东部定居，并取得了对卡兰塔尼亚的宗主权。

13 公元8世纪时，加洛林王朝的法兰克国王们恢复了对巴伐利亚人的控制，791年以后，查理曼（Charlemagne）率领法兰克人和巴伐利亚人反击阿瓦尔人。803年，阿瓦尔人被赶回菲沙河（Fischa）和莱塔河（Leitha）一带，大片的移民地被开辟了出来。在这个地区建立起一个从多瑙河到亚得里亚海（Adriatic）的边区防御体系，这一举措显然是必要的：该地一直受到各种冲突的困扰，或是因为斯拉夫人的叛乱和保加尔人（Bulgar）的攻击，或是因为内部的竞争和“大摩拉维亚王国”（Great Moravian Kingdom）的干涉，后者是北方的一个斯拉夫强国。但最严重的是公元9世纪末期马扎尔人（Magyars）的袭击。

像阿瓦尔一样，马扎尔人的力量也来自骑兵。为了躲避更为强大的部落，他们离开欧亚大草原，862年开始出现在这个地区。起初他们人数很少，并在法兰克人和摩拉维亚人（Moravians）的战争中充当雇佣兵，但是，896年，大批马扎尔人来到后来所称的匈牙利平原上，“匈牙利风暴”进入最猛烈的阶段。一开始，以骑兵为基础的马扎尔部队远远优越于法兰克军队。马扎尔部队从位于多瑙河谷地的基地出发，肆无忌惮地洗劫周边地区。906年，他们打败摩拉维亚人，907年在普雷斯堡（Pressburg）摧毁巴伐利亚军队。加洛林各边区瓦解了。巴伐利亚人的边境退回到恩斯河，但马扎尔抢劫者甚至经常渡过恩斯河。在5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马扎尔人使这个地区笼罩在恐怖中。

955 年 8 月 10 日，国王奥托一世（Otto I）和日耳曼人在奥格斯堡（Augsburg）城外的莱希菲尔德（Lechfeld）击败马扎尔人和巴伐利亚叛乱者的联军。

莱希菲尔德战役对中欧历史有重大影响。962 年，奥托一世利用他新确立的权威和声望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是“皇帝”世系中的第一个，这个世系一直维持到 1806 年，皇帝们的国体则以德意志为核心。^① 在多瑙河谷地，莱希菲尔德战役之后，恩斯河东部的土地被慢慢收回，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很多马扎尔人到来之前的社会状态依然保留着。奥托一世在这里建立了另一个边区，976 年以后，边地伯爵卢特波尔德（Luitpold）成为其首领，他是巴奔堡家族的第一个统治者。巴伐利亚军队把这个新边区的边境沿多瑙河向东推进，1002 年，边境线抵达维也纳周围地区。与此同时，卡兰塔尼亚于 976 年成为独立的公爵领，那里建立的边区后来成为卡尼奥拉（Carniola）和施蒂里亚（Styria）。虽然 996 年首次出现的“ostarrichi”一说还不是奥地利历史的确切开端，但它的确发生在这个地区的历史转折点上。接二连三的部落入侵的“黑暗时代”终于结束，后来“奥地利”的地理中心已经确定下来。

14

这个中心地区已经拥有一份复杂的遗产。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一波一波的人民，都留下了各自的烙印。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是巴伐利亚人，西部地区直到康斯坦茨湖一带是阿勒曼尼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占大多数。但是，当不同的部落席卷该地区时，原有的居民或者接受某种形式的臣服，或者迁往高山或森林深处。尽管有流放、撤离和屠杀，但这些行动并不彻底。在罗马时代，大部分凯尔特人已经“罗马化”，公元 4 世纪以后还逐渐基督教化。

罗马的统治在日耳曼人入侵之前就已经瓦解，但少量“罗马”人仍然留在当地，例如在萨尔茨堡周围。很多罗马地名保留了下来，如

^① 奥托一世以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也是德意志国王，由它的大诸侯（即后来的选帝侯）选举产生；德意志国王也是“罗马人的国王”；当选的德意志国王只有在罗马接受教皇的涂油后才能正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此很多“皇帝”正式来说仅仅是国王。

萨尔茨堡的一个郊区戈洛迪格 (Grödig, 来自罗马名 Crethica)。萨尔茨堡在公元 8 世纪时仍以拉丁名尤瓦武著称。在德语中, 原来的“罗马人”被称作 Walchen 或 Welsche (这个词与威尔士人 Welsh 在词源上是同根的), 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居民团体中, 继续保持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和语言, 这种拉丁语方言后来被称作罗曼什语 (Romansch)。公元 7 世纪和 8 世纪时, 基督教再度传入这一地区, 当时的传教团多由英国或爱尔兰的教士领导, 如温弗里德 (Winfriid, 或 Bonifatius) 和克伦巴努斯 (Columbanus, 或称 Kolumban), 这些传教士发现当地已经存在很多“罗马”基督教社团。

15 在奥地利地区, 罗马和基督教的影响从来没有完全消失。罗马的统治在 500 年左右瓦解, 但 739 年, 萨尔茨堡已经变成了一个主教区, 798 年升格为大主教区。奥地利地区文化和语言上占主导地位的是日耳曼诸部落, 尤其是巴伐利亚人, 德语方言的采用和绝大多数罗曼什语居民区的消失就是明证, 但日耳曼居民也采用了罗马人的习俗, 如种植葡萄, 还有城市中的罗马街道布局, 以及田野上的罗马耕地规制。公元 7 世纪以后, 巴伐利亚人也慢慢皈依基督教, 随着拜占廷东正教在公元 9 世纪的竞争中受挫, 奥地利地区再次在宗教上成为罗马世界的一部分。

阿瓦尔人的入侵和斯拉夫人在阿尔卑斯山东部大片地区的定居为这种已然复杂的混合局面平添了另一种。虽然日耳曼人最终胜出, 但很多斯拉夫社区留存下来, 虽然它们后来采用了战胜者的日耳曼语言。马扎尔人的插曲也对这里的局面造成了一些冲击。奥地利一带的居民远远不是来自一个纯粹的种族, 和欧洲很多其他地区一样, 这里也有很丰富的民族和文化交汇现象, 尽管巴伐利亚因素占了支配地位。

二、巴奔堡时代, 1000—1278 年

1000 年, 匈牙利国王斯特凡 (Stephen) 皈依基督教。斯特凡在将马扎尔人改造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以后, 开始遏制巴伐利亚人向东边多瑙河平原的推进。诚然, 1030 年, 当斯特凡和马扎尔人在军事上大获

全胜时，日耳曼人的东进势头被遏止并部分地倒转方向，但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的冲突仍很激烈。然而，由于面对的是一个基督教对手，日耳曼人在东部边区的行动有了新的限制。多瑙河地区从一个备受权力剧烈变动之苦的地带变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这就使得权力集团能够发展并巩固下来。

巴奔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边区只是这类权力集团中的一个，而且明显不是最强大的一个。它的北部和东部是一些非日耳曼人的王国，如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波兰，但它们的国王是基督徒。同这些王权实体比起来，区区一个奥地利边地伯爵就像个小配角，直到 1156 年，伯爵还臣服于巴伐利亚公爵。 16

即使与今天的奥地利比起来，最初的几位巴奔堡边地伯爵控制的领地也是十分狭小的。在西边，萨尔茨堡长期是巴伐利亚的一部分，并逐渐向教会领地发展，其管理者是当地大主教。在萨尔茨堡西边的蒂罗尔，小地主统治仍是通例，直到蒂罗尔伯爵（其名号来自他们位于米兰诺 [Merano] 附近的城堡）在 12 世纪控制该地时为止。今天的福拉尔贝格还是一块封建势力的百衲布。这里更加远离巴奔堡的权力基地，大部分居民是阿勒曼尼人。 17

在南方和西南方，卡林提亚和新的施蒂里亚边区（或称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逐步发展为独立领地。卡林提亚于 975 年成为公爵领，其传统可以追溯到斯拉夫人和卡兰塔尼人的首领缔结联盟之时。一直到 15 世纪，该地的新公爵上任还需举行双重仪式，第一个仪式在卡恩堡（Karnburg）举行，卡林提亚人民的一位象征性代表让公爵安坐在“诸侯石”（Fürstenstein）上，这件物什是罗马石柱的遗迹；这个仪式过后，公爵再坐在措尔菲尔德（Zollfeld）的“公爵凳”（Herzogsstuhl）上向贵族封授采邑。这个仪式带有异教色彩，并意味着权威来自下层，因而在 1414 年被废弃。第二个仪式符合天主教教义，象征着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故一直延续到 17 世纪。不过，卡林提亚虽然有自身的延续性，但它是个不断衰微的力量。由于内部的封建混战，这个公爵领日渐虚弱，边区一个个脱离——其中包括卡尼奥拉、

弗留里 (Friuli)、伊斯特里亚 (Istria) 和维罗纳 (Verona)，它的领地也大量缩减。



插图3 卡林提亚的诸侯石 (卡林提亚省档案馆)

施蒂里亚一开始有3个在莱希菲尔德战役后建立的卡林迪亚人边区。不久，卡林提亚最东边的4个伯爵领并入施蒂里亚，以便获得军事上的支持来对抗马扎尔人持续不断的威胁。施蒂里亚地区的居民最初大部分是斯拉夫人，后来特劳恩高尔 (Traungauer) 家族成为这里的统治者。这个家族的城堡在施泰尔 (Steyr, 施蒂里亚 [Styria] 的名称即源于此)，又称奥塔卡尔 (Otakar) 家族，他们以通常的封建手段，即战争和联姻建立起权威。1180年，奥塔卡尔四世获得公爵头

衔，从而摆脱了臣服于巴伐利亚的最后的痕迹。1186 年，奥塔卡尔家族因无法推出继承人而被迫订立乔根堡（Georgenberg）条约，巴奔堡家族于 1192 年接管了施蒂里亚。

因此，巴奔堡家族自己的边区只是它在奥地利众多权力基地中的一个。但是，即使在自己边区的内部，巴奔堡家族的权威也远非是完整的。边区最好的土地很多控制在教会当局手中，尤其是萨尔茨堡大主教区和帕绍（Passau）主教区。在封建主义制度框架下，剩下的土地大部分被边区的贵族控制，巴奔堡家族真正可以凭靠的只有自己的庄园领地。在随后的岁月里，这个家族通过继承、购买和没收等手段大大增加了直接控制的产业，但别的贵族世家势力仍很强大。绥靖边区贵族的斗争是持续漫长的，这种斗争或通过协商，或采取武力形式。为了给这场斗争提供协助，巴奔堡家族引入了“协理人”（ministeriales），如库恩林格（Kuenringer）家族，这个家族虽然是契约奴仆，但负有广泛的行政和军事职责。不过协理人逐步演变成一种新的服役贵族，他们急于摆脱自己的卑下身份，并成为抵制公爵权威的另一种潜在势力。但与此同时，在保卫边区免受通常更为强大的邻人的攻击时，巴奔堡家族与自己的贵族存在某种相互依赖关系。

18

在中世纪的权力政治中，巴奔堡这样的家族需要大胆而高明的手腕来协调内部封臣之间的关系、维持并改善其外部地位。同样，它还需具有不断再生的运气和能力，以便比那些家族竞争对手延续得更长久。在几乎 3 个世纪的时间里，巴奔堡家族的表现十分出色。到 13 世纪，它已成为神圣罗马帝国东南部一个辽阔的长条地带的统治者，拥有公爵头衔，同时占有奥地利和施蒂里亚，并与帝国皇室霍亨施陶芬（Hohenstaufen）家族联姻。

这种成就是几代巴奔堡人靠精明的手腕取得的，当然其中也经历了很大的风险。王朝世家的成败经常系于偶然，最漂亮的计划会因为战场上的阵亡或疾患而告吹。面对如此众多的权力分层和涉足者，任何王公都得仰赖其盟友的成败及其通常不可预测的后果。

帝国的政策受皇帝和教皇之间斗争的左右，这场争斗开始于 1075

年的授职权危机之时，接着转变成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之间的战争（Guelph-Ghibelline Wars）。在这场斗争中，巴奔堡家族表现出了它的精明之处，它支持一方或另一方、或双方都支持，一切都要看具体情势。这个家族的两个统治者尤其精于在皇帝和教皇的冲突中见风使舵以增强自己的内部根基。在这两个人当中，父亲列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因为反对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而一度被剥夺边区，儿子列奥波德三世（Leopold III）支持亨利四世的儿子亨利五世（Henry V）的反叛，因而最终赢得了教会和帝国的双重好感。凭借自己的效劳，列奥波德在1106年迎娶了皇帝的妹妹，此举大大提高了巴奔堡家族的声望。但此后他与帝国政治生活拉开距离，专注于绥靖奥地利贵族的事业。他对教会十分慷慨，新堡修道院（Klosterneuburg）和圣十字修道院（Heiligenkreuz）都是他创办的。他于1485年被封为圣徒，最后又被称为奥地利的主保圣徒。

与他同名的列奥波德六世（Leopold VI）在12—13世纪之交奉行相同的政策。在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的冲突中，他坚定地支持自己的亲戚霍亨施陶芬家；不过他也是教会的大庇护人，建立了一些修道院并参加过多次十字军行动，既有在中东也有在西欧的行动（在西欧是攻打阿尔比派 [Albigensians] 和西班牙的穆斯林）。他的女儿嫁给了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II）的儿子亨利七世（Henry VII），1230年，他成功地调停了皇帝和教皇之间的冲突。在奥地利境内，列奥波德六世对贵族实施监控，他还从封君手中买下了几个城镇，其中包括威尔斯（Wels）、林茨（Linz）和弗莱施塔德（Freistadt），因为他认为这些城镇将来会成为财富和权力的基地；此外，他还大大拓展了维也纳的发展前途。在大力增强内部资源根基的同时，他也强化了对自己的公爵领的控制，作为皇帝政治上的同盟者，他的地位大为增强。

巴奔堡家族的另一一些统治者则没有这么精明，但总的而言他们还是有所成就，虽然有时他们也会失败。1156年，绰号“神佑者”（Jsomirgott）的亨利二世（Henry II）获得公爵头衔，成为第一位奥地